

书史杂议

——对订补本《中国书史简编》的几点意见

柏耀新

最近，获读书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郑如斯同志订补的刘国钧先生著《中国书史简编》，又重检刘先生58年版原著及北京大学56年级用《中国书史讲稿》（初稿、油印本）细加校读，认为订补本有些问题似可商榷。拉杂记下几条意见，今不揣冒昧，整理如下，因其杂，乃以杂议为题。

1. 关于青铜器的起源

刘先生58年版《中国书史简编》（以下简称原书）及56年油印本《中国书史讲稿》（以下简称讲稿）在谈到我国青铜器的起源时，只上溯到殷墟时期。认为青铜器出现在“公元前一千三百多年前，当殷朝后半期”。这在当时是正确的。因为刘先生的讲稿写成于五十年代中前期，在以《中国书史简编》为书名出版时只作了少量修改，而当时对青铜器起源的认识也确实在这样的水平上。二十多年来，考古发掘得到的青铜器不在少数，青铜器的研究工作有了长足的进展，刘先生旧说也有修订之必要。五十年代河南省辉县和郑州的发掘，确定了早于殷墟的二里冈时期青铜器。七十年代偃师二里头遗址的发掘，又确定了早于二里冈的二

里头时期的青铜器。在考古学上，我国青铜器年代的上限就提早到了夏商之际。这一论断在七十年代已经确立。^①而郑如斯同志订补的《中国书史简编》（以下简称订补本）虽定稿于81年4月（参见该书再版前言）或更晚（该书于82年12月出版），却仍沿用刘先生旧说，显然就晚了一些。近年来，涉及青铜器起源的论述很多：有人认为早期青铜器应在龙山文化中去探求；^②有人认为出现青铜器的年代应早于齐家文化时期；^③还有人认为一九七五年在甘肃东乡林家马家窑遗址和永登连城蒋家坪马厂文化遗址分别出土的铜制的刀，是目前在我国境内发现的最早的两件青铜器物，说明我国在公元前三千年至公元前二千三百年间已有了青铜器物。^④为慎重起见，我们不妨用李学勤先生和殷玮璋先生在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作的论断：二里头三、四期发现的青铜器属中国目前发现最早的青铜器。^⑤

2. 关于最早的医学书

刘先生原书及讲稿称《内经》为我国最早的一部医学著作。如前所述，这在当时同样是正确的。但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的医学帛书、竹简出土后，这一问题似应重新讨论。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的五卷帛书及二百根竹、木简上用二万余字秦篆（或说古隶书）抄录了十五部医学佚书《足臂十一脉灸经》《阴阳十一脉灸经》甲本和乙本、《脉法》、《阴阳脉死候》、《五十二病方》、《却谷食气》、《导引图》、《养生方》、《杂疗方》、《胎产书》和《十问》、《合阴阳》、《杂禁方》、《天下至道谈》。其中，《胎产书》中关于妊娠逐月养胎的论述，把隋代巢元方著的《诸病源候论》中有关记载推前了七个世纪，是我国最早的妇产科专著；而《五十二病方》则是我国现存最古的方书。上述佚医书的发现，已从多方面证明：《内经》并不是我国最早的一部医学著作。^⑥上述佚医书中《导引图》、《五十二病方》

在80年就已由文物出版社出版。而订补本仍依刘先生旧说，以《内经》为最早，似应加以修订或加注说明。

另外，订补本第三十三页称72年武威旱滩坡出土的医简是“现今最古、最完整的医学典籍了”。此说也可议：旱滩坡出土医简共92枚，其中一简题有“右治百病方”，可证至少一部分是《治百病方》。而《治百病方》只代表《五十二病方》到《伤寒杂病论》之间过渡时期的水平，时间晚于《五十二病方》。^①武威旱滩坡医简于72年11月出土，较详细的报导见于《文物》73年12期，是时长沙马王堆二、三号汉墓刚开始发掘，因而可称武威医简为最古。（长沙马王堆二、三号墓发掘简报见于《文物》74年7期，详细研究又在其后）但在七十年代末，特别是《五十二病方》出版后，我们就不宜再称武威医简为最古了。再就其完整性而言，只能是比较而言，医简中一部分为《治百病方》，其它则比较杂，^②完整程度似难下结论。80年文物出版社是以《武威汉代医简》为名出版的。称“最完整”，似嫌武断。近年来有学者引述武威汉代医简时，称其为“我国迄今所知最早的、内容比较完整的古代医方文献之一”，^③这样的论断，就科学得多了。

3. 关于印刷术传入朝鲜的年代

刘先生原书在第五章第四节中说：“雕版印刷术发明不久，就传到我们东方近邻朝鲜（当时称为高丽），朝鲜在九世纪末就已经有了刻本的书。”由于高丽建国为公元919年，已是十世纪初，既然称朝鲜在九世纪末就已经有了刻本的书，那么当时就不应该是高丽。订补本将上文中（当时称为高丽）改为（当时为百济国），其他则未加更改。这里有两点可以商榷：

（1）订补本将高丽改为百济，似有订正之意，但仍和史实相左：因为订补本将我国印刷术发明的年代定在七世纪末、八

世纪初（参见该书第58页），传入朝鲜当在其后。而朝鲜在四至七世纪是高句丽、新罗、百济三国鼎立，百济、高句丽分别于660年及668年为唐所灭。百济、高句丽灭亡后，新罗于675年文武王在位时统一朝鲜。次年，唐安东都护府（原设平壤）被迫迁至辽东（今辽阳县）。这样，朝鲜半岛才结束了一千多年来的分裂局面，形成统一的国家。^⑩如果说我国印刷术在七世纪末、八世纪初发明，那么传入朝鲜在当时应称传入新罗为宜。

（2）关于“朝鲜在九世纪末就已经有了刻本书”这一点，刘先生在《中国的印刷》一书中已作修正：他在该书中写道，“相传九世纪中叶（唐宣宗大中年间），新罗文圣王就已经雕印了全部《大藏经》。但是这一传说是不可靠的。……从现存记载看，比较可信的说法是在第十世纪。”^⑪《中国的印刷》初版于60年6月，晚于《中国书史简编》。该书于79年6月再版时，上述观点未加改变。可见，刘先生在六十年代初就修正了“九世纪说”，而代之以“十世纪说”。订补本沿用刘先生五十年代旧说，显然是不妥的。

4. 关于现存最早的印刷物

订补本引述了1979年《书林》第2期报导的关于南朝鲜发现汉译本《无垢净光大陀罗尼经咒》的消息，并说如确实，则可作为我国至迟在八世纪已有印刷术的旁证。论断是正确的，但引述时将该件印刷物的发现时间误作1969年。考之原文，应为1966年。关于这件印刷物，《书林》80年3期已译出L.C.Goodrich（中文名富路特，一说善富）的一篇报告，胡道静先生为之作了注。^⑫报告称该件印刷物是1966年10月14日在南朝鲜东南部庆州（古新罗首都——笔者注）佛国寺释迦塔第二层舍利洞发现的，全称《无垢净光大陀罗尼经》，无“咒”字。这里，印刷物出土年代及其名称，订补本应加订正。

5. 关于陆深《河汾燕闲录》的引述

刘先生在原书第四章中写道：“明朝的陆深在其《河汾燕闲录》卷上里说：‘隋开皇十三年十二月八日敕：废像遗经悉令雕造。此印书之始’。胡应麟在其《少室山房笔丛》里也说印刷‘肇自隋时，行于唐世，扩于五代，精于宋人’。这两人都以隋费长房所著《历代三宝记》上的记载为根据。……陆深误以‘撰’为‘造’，而认为雕造经版。”订补本沿旧说，未加变动。这里有二点可辨：

（1）考之陆深《河汾燕闲录》原文，应是“隋文帝开皇十三年十二月八日敕：废像遗经，悉令雕撰。此印书之始，又在冯瀛王先矣。”陆深误以为雕撰为雕板印刷，但陆深并未说“雕造”，“雕造”应是后人所改。这里，刘先生可能是转引所误。

（2）从《河汾燕闲录》原文看，陆深是以《历代三宝记》的记载为根据。但胡应麟则不是，胡应麟在《少室山房笔丛》甲部，《经籍会通·四》说：“载阅陆子渊《河汾燕闲录》云‘隋文帝开皇十三年十二月八日敕废像遗经，悉令雕板，此印书之始’。……”又说：“编综前论，则雕本肇自隋时，行于唐世，扩于五代，精于宋人。此余参酌诸家，确然可信者也。”可见陆深据于费长房，而胡应麟据于陆深。这里，倒是胡应麟改雕撰为雕板，后来人以讹传讹，成了“雕造”。

6. 关于沈括《梦溪笔谈》的引述

刘先生原书引述了沈括《梦溪笔谈》卷十八中毕昇发明活字印刷的一段文字：“版印书籍，唐人尚未盛为之，……庆历中，有布衣毕昇又为活板。……昇死，其印为予群从所得，至今宝藏之。”（此处仅略引——笔者）而订补本引述时“毕昇”改为“毕升”，不知订补本称“毕升”所据什么版本。我们知道，由于版本不同，有两个问题是曾有争议的：①“毕昇”与“毕升”

是否同一人；②“予”是否为“子”之误刻。

就《梦溪笔谈》的刻本而言，一般多推宋乾道二年（公元1166年）扬州州学刊本为最古，但已佚。66年元大德陈仁子刻本未发现之前，一般以汲古阁本及崇禎马元调本为善。王国维先生在北京图书馆藏崇禎马元调刻本《梦溪笔谈》毕昇条下有眉批云：

“卷二十云，‘祥符中有老锻工毕升曾在禁中为王捷锻金’云云，当即此人”，是认为毕升与毕昇为同一人。⑬而张秀民先生认为值得怀疑，其论据之一，即是“昇”与“升”音同，字不同。

⑭刘先生在《中国的印刷》一书中也认为值得怀疑，但老锻工毕升的“升”字，却作“昇”。⑮今据元大德陈仁子刊本考之，则卷二十所记老锻工作“毕升”，而卷十八所记确为“毕昇”，⑯

因而订补本改毕昇为毕升似可议。另外，引文中“昇死，其印为予群从所得，至今宝藏之”一句，如“予”作第一人称解，则毕昇与沈括的子侄有关；有人以为“予”为“子”之误，则与毕昇儿子有关，而与沈括可以无关。这一问题，刘先生是以“予”为准，认为与沈括子侄有关。⑰但毕竟有人持怀疑态度。⑱而元刊本所记是：

“昇死，其印为余群从所得，至今保藏。”显然可证“予”非“子”之误。因为“予”与“余”相通，而“余”在古代只能作第一人称解释。顺便提及，在元刊本中“予”“余”相通，及“余”不作后起义的“剩余”的“余”解有很多例子：卷一，中国衣冠条下有“胡人乐茂草，常寝处其间，予使北时皆见之……”，卷三有“余考乐律及受詔改铸浑仪……”。可证“予”与“余”相通。卷十八有“以直高为勾，以上广减下广，余者为股……”，可证剩余之“余”元刊本用“余”。据此，可以认为汲古阁本、崇禎马元调本用“予”未失原意。

由于元刊陈仁子本卷首有乾道二年汤修年跋，说明此刻本源于乾道扬州本。因此，订补本的的整段引文如能用元刊本校一下，或加注说明一下，则可清旧疑。

7、 关于铜活字印书

刘先生原书在叙述明代印刷术时说，无锡华氏会通馆、兰雪堂、安氏桂坡馆“应用铜活字排印各类古书”，并举《锦绣万花谷》、《容斋随笔》、《春秋繁露》等为例说明。订补本仍其旧。关于这一问题，潘天祯先生已有考证，认为“华燧所印原书上的‘活字铜版’的确切理解应是‘锡活字铜版’而不是‘铜字版’。”^⑩潘先生考证周详，立论严谨，证明至少无锡会通馆印书是锡活字。订补本或未见潘文，如已见，而仍持旧说，则最好加注说明。

8. 关于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

刘先生油印本讲稿在第八章第二节（国民经济恢复期间的图书和出版事业）中论及中国作家的文艺作品在出版事业中占有重要地位，并举《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暴风骤雨》、《铜墙铁壁》、《把一切献给党》等书为例。^⑪但在58年正式出版时，由于当时的历史原因，删去了《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这在当时，是可以理解的。三中全会后，丁玲同志得到了平反。那么获得斯大林文学奖金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当然也应该平反，该书在文学史上和书史上的重要地位自是世所公认。订补本仍据刘先生58年版旧文，建议据油印本讲稿改正为宜。

9. 关于卡特著《中国印刷术的发明和它的西传》的译者

订补本书末附有参考书目录，其中卡特著《中国印刷术的发明和它的西传》一书，记作刘麟生译，1957年商务印书馆出版。这里似有误：卡特（Thomas、Francis、Carter 1882—1925）原著是在他生前出版的，1931年重印一次，我国的最早译本是刘麟生译（民国二十五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但当时的书名为《中国印刷术源流史》。据称该书“颇有删节”。^⑫1955年，卡特原著

由L.C.Goodrich（即本文前面谈到的富路特）博士作了增补后重新出版，我国重由吴泽炎译出，1957年12月商务印书馆作初版出版。②因而参考书目如用1957年商务印书馆的本子，则译者应是吴泽炎。

以上是就内容提出的几点意见。另外，订补本订补后的语句也有几处疏忽，如第八章增写了第四节（1958年以后我国图书出版事业的发展变化）后，原第三节（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的图书和出版事业）中许多“近年来……”的句子未予删去，（58年以前的内容在现在不好再称近年来了）而使全书语气不统一；又如第十六页有“现存的最古的文字记载是商朝后期（殷）的甲骨文书”，而第十七页说“甲骨文是我国最古的文字记载”。删去“现存”两字，使文义不科学。

还应指出，订补本在付印时校对粗疏，错别字很多，粗略估计有三、四十处。其中由于错别字引起文义错误或史实错误的有多处。如：第一百二十三页中华书局成立应为1912年，误作1921年；第十九页智鼎误为翌鼎（参见《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83页，《考释》96页），第八十二页嘉靖以前缺“前”字，第二十三页公元前一千三百多年之前，缺“公元前”的“前”；第五十五页扩于“五代”误为扩于“王代”。至于人名、书名、地名错误就更多一些，如：第五十七页叶梦得误作叶萝得（误将梦作萝）；第八十四页冯梦禛误作冯萝禛；第六十一页陈观误作陈欢；第五十五页陆深和第四十一页钟嵘的名字用了别字“琛”和“荣”；第三十三页《尉繚子》误作《尉縗子》；第一一九页《劝学篇》误为《劝字篇》；第三十二页仁寿阁误作仁寿闾；第八十页济美堂误作济类堂等等。还有不适当地用古体字，如第七十五页《元丰类藁》，应为《元丰类稿》。这里，“元丰”用了简化字，而“稿”却用了古体别字。“稿”的古体为“藁”，而“藁”是河北藁城县的“藁”。另外，第七十八页《增外六臣

六臣注》似应为《增补六臣注文选》（参见《增订四库简明目录标注》）；第一一二页《墨海金壶丛书》似应为《墨海金壶》（按，《墨海金壶》是丛书，但作书名仅称《墨海金壶》。参见《书林清话》等常见书刊）。还有许多常见错别字如“淫威”误作“谣威”、“桎梏”误作“桎酷”等等，限于篇幅，不再一一列举。固然，这可能不是订补者的责任，但由于这么多错别字的存在，一定程度上破坏了本书作为学术著作的严肃性，是为憾事。

以上，仅是个人不成熟的一些意见，仅供这书再版时参考。错误不当之处，恳请指正。

注：

- ① 参见李学勤：《新中国的青铜器研究》，《文物》1979年10期。
- ② 参见安志敏：《中国早期青铜器的几个问题》，《考古学报》1981年3期。
- ③ 参见北京钢铁学院冶金史组：《中国早期铜器的初步研究》，《考古学报》1981年3期。
- ④ 参见杜迺松：《近年来青铜器发现和 research 的主要收获》，《光明日报》83年2月16日。
- ⑤ 参见注①及殷玮璋：《先秦考古》，《中国历史学年鉴》1982年（81年资料）。
- ⑥⑦ 参见戴应新：《解放后考古发现的医药资料考述》，《考古》1983年2期。
- ⑧ 《武威汉代医简》文物出版社，1980年第1版。
- ⑨ 胡枫：《中国古典文献学》，齐鲁书社，1982年。
- ⑩ 参见周一良：《世界通史·第九章》。
- ⑪ 刘国钧：《中国的印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年6月第2版。
- ⑫ 参见《书林》1980年3期。
- ⑬ 参见张秀民：《中国印刷术的发明及其影响》第74页注①引文。

- ⑭ 张秀民：《中国印刷术的发明及其影响》第75页。
- ⑮ 刘国钧：《中国的印刷》第四节。
- ⑯ 《元刊梦溪笔谈》，文物出版社，1975年影印本。
- ⑰ 参见刘国钧：《中国的印刷》。
- ⑱ 参见张秀民：《中国印刷术的发明及其影响》。
- ⑲ 潘天祯：《明代无锡会通馆印书是锡活字》，
《图书馆学通讯》1979年1期。
- ⑳ 刘国钧：《中国书史讲稿》油印本第79页及郑如斯订补《中国书史简编》第142页。
- ㉑ 张秀民：《中国印刷术的发明及其影响》附录三。
- ㉒ 卡特：《中国印刷术的发明和它的西传》译者前记，商务印书馆
1957年12月第1版。

《彝族天文学史》问世

陈久金、卢央（彝）、刘尧汉（彝）三同志合著的《彝族天文学史》，最近已由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这部著作的出版，将对我国自然科学历史研究、少数民族文化研究有着重要价值。

全书共十二章：“彝族文化史概略”“西羌、巴窠与彝族上古先民的天文学”，“恒星观测”，“天文观测和天体运动的研究”，“十二兽历法”，“彝族太阳历”，“火把节星回节是彝族太阳历新年”，“《夏小正》和彝族太阳历同源於羌夏古历”，“彝族阴阳历”，“彝族的宇宙理论”，“彝族星占学”，“彝族八卦”。该书除介绍带有彝族特点的天文观测方法、星座知识、自己的历法和宇宙观念以外，同时还涉及若干其它方面的课题，如中国远古时代曾经普遍地使用过的《夏小正》与十月太阳历、十二兽纪日的起源、卦的起源、阴阳五行理论的起源等等。这些珍贵的资料不仅挽救了濒于泯灭的彝族天文学，而且还填补了我国少数民族科技史方面、特别是天文学的空白。它将对研究我国彝族的文化史、中国文化史、哲学史、世界历法史、民族关系史、民族学史，具有重大的意义。

• 林敏 •